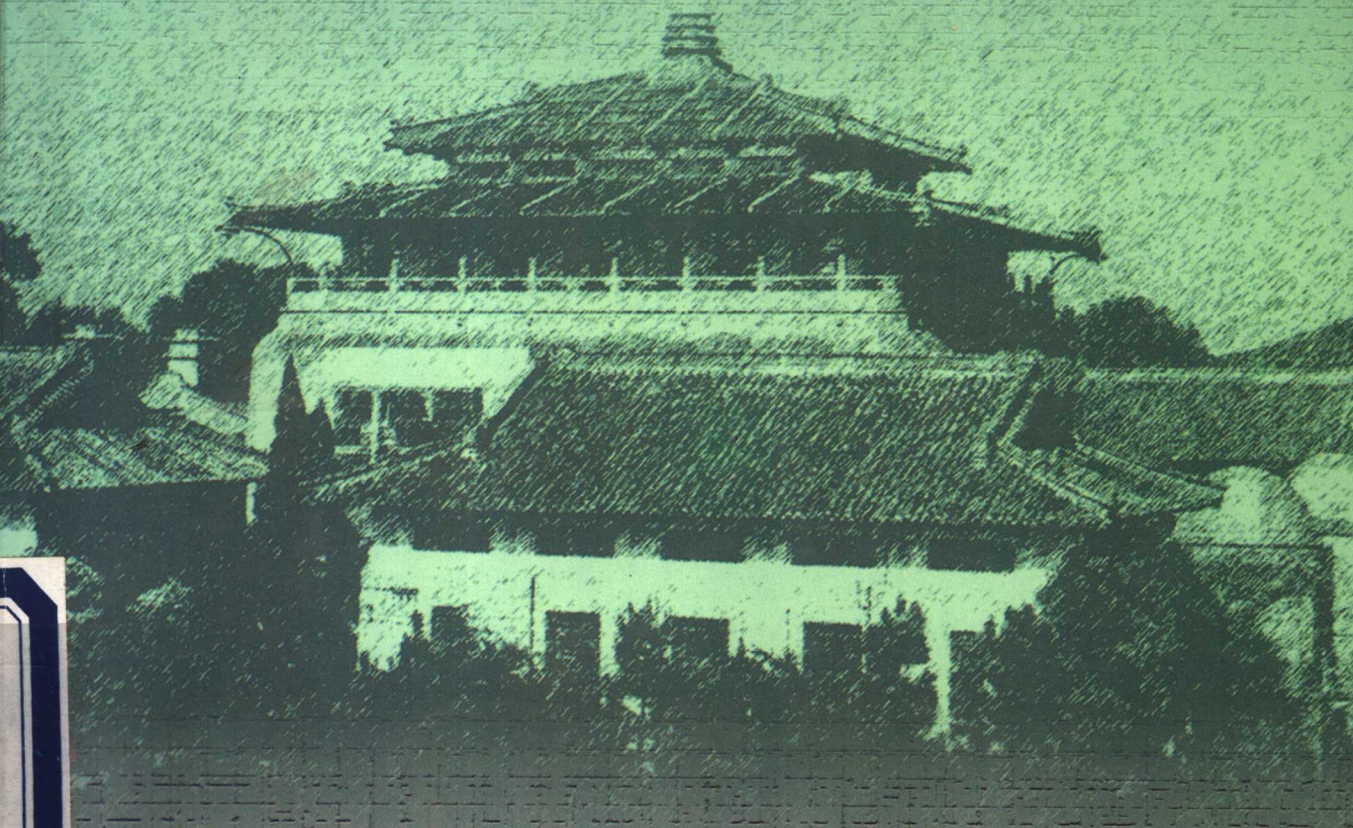


长江学术



第三辑

武汉大学中文系
长江文艺出版社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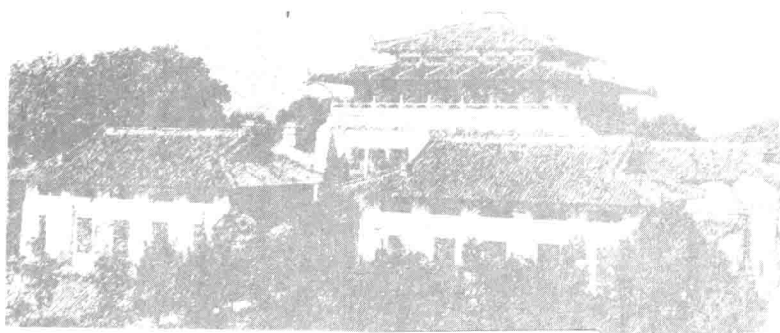


长江学术

第三辑

武汉大学中文系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XUESHU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江学术/武汉大学中文系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54-2332-9

I. 长…

II. 武…

III. 学术论文-中国-当代

责任编辑: 常 江 责任印制: 周铁衡

封面设计: 小 加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85443721 传真: 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 85443862

印刷: 湖北省人事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1

版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50 千字

I. 1794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 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与文学”笔谈

- 文化全球化及其民族基础····· 王向峰 (1)
-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 王哲平 何玲华 (5)
-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焦虑与选择 ····· 戴 黛 (11)
- 全球性问题中的两个关键词：
 现代性与意识形态性 ····· 姚文放 (15)

文艺学研究

- 艺术的商业价值与人文价值 ····· 高小康 (20)
- 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第三种悲剧观 ····· 时晓丽 (24)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 ····· 童庆炳 (27)
- 吴敬梓思想面貌寻踪记略 ····· 陈美林 (34)
- 情寓其中
 ——对唐人两类送别诗的民俗观照 ····· 张忠纲 赵睿才 (44)
- 论春秋战国时期爱国的两种模式
 ——对《论语》、屈赋文化精神的一种探索 ····· 罗敏中 (52)
- 杜诗“白帝夔州各异城”之现地研究 ····· 简锦松 (60)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论世纪之交历史题材小说的现代性进程 ····· 吴秀明 (70)
- 略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修养 ····· 俞汝捷 (79)
- 关于 50—70 年代文学中的反面人物形象····· 程光炜 (85)

“新传奇”与“好神话”的建构方式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之比较 杨剑龙 傅建安 (93)

“问题”文本与“话语”规约

——关于赵树理解放前小说创作的“修辞行为”分析
..... 席扬 (101)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简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孟庆枢 (110)

马尔克斯的历史小说与小说中的历史 张淑英 (117)

寓言小说抑或历史小说

——关于马哈福兹的《平民史诗》 杨传鑫 (127)

别格·托马斯——美国文化的土生子 李怡 (133)

古汉语与文献学研究

韵语分析与古文《尚书》辨伪 张民权 (137)

《法言》词类活用不合先秦常规例析 田春来 罗积勇 (144)

《文子》篇目考 王三峡 (149)

《山海经》病名考(上) 骆瑞鹤 (156)

阳承庆《字统》考探 徐时仪 (163)

“木桃”、“木李”新证 万献初 (171)

言语与言语学研究

研究语言不能不研究言语 郑远汉 (177)

言语学刍议 张延成 (184)

关于建立言语学的思考 王敏 吴礼权 (195)

语言规范、言语规范与文学语言规范 杨合鸣 杨爱姣 (200)

语言·言语与二元属性 冯学锋 (203)

大力开展汉语言语运用的研究

——在“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闭幕式上的发言 陆俭明 (207)

珞珈学人研究

刘永济与传统词学的现代化…………… 陈水云 (209)

探赜索隐 笃实精深

——吴林伯先生《〈文心雕龙〉义疏》读后…………… 陶然 (216)

探讨与商榷

误读与辨析

——答毛崇杰先生…………… 吴炫 (219)

硕博论坛

徐孝的反切主张、实践及其影响…………… 周赛华 (222)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施顿号说略…………… 殷榕 (227)

邵雍诗韵考…………… 李清桓 (231)

珞珈书林

评马晓朝《宙斯的霹雳与基督的十字架》(236) / 《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237) / 《中国新诗流变论》(238)

博士论文摘要

《反抗沉沦——郁达夫文化心理分析》(240) / 《新月派研究》(241) /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论稿》(242) /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作版本校评》(243) / 《动词句同义句式研究》(245)

学术动态

首届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郑梦娟 (246)

《长江学术》稿约

文化全球化及其民族基础

王向峰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问题，是当前学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这与我国加入 WTO，进入了世界经济贸易的成员国平等联合组织有直接关系。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地推动文学与文化的全球化。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这种交流与共享不止是个别国家之间，而是在相当多的国与国之间具有广泛规模地展开，形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互动关系。但是这种文化的互动决不是只有单一的以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的文化为唯一存在，而是由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所构成的全球性的文化。

虽然当前的文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它却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论述过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所带来的文化结果，其表现之一就是世界文学的形成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这种文化格局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地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上述的世界文学及其背景，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但却是世界现代史上的文化全球性最早的开始，其中已经包含现代全球化的意义，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活动，并不仅是单纯地属于本民族，只在本国本民族中得到交流和享用，而是从国家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具有某种共同共通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的关系，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利益是并不相同的，但趋向却是从封闭、隔绝、拒斥而走向超国界的交往与交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初步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开始。

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民族化的对立矛盾存在是单极化。由于国家、民族的强势不同，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利益要求也不同，超越平等互利的原则的“全球化”则将导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甚至会走向严重的单极化。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说“‘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会掩盖一个事实：资本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恰恰是将国际和国内双重的单极化运动融为一体，构成资本全

全球化的中心。单极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本能够更多地从中受益。全球化运动结束了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融合和趋同趋势。”沙奈继续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的不同，他说：“单极化首先是国际范围的，它使处于世界垄断中心的国家、与中心的国家合作的国家和位于周边地带的国家之间突然形成巨大的鸿沟。……完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热潮边缘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和不平等贸易的共同作用下，不仅成为附属国、原料储备国，而且完全如同帝国主义‘经典’时期一样：对于处于世界垄断中心地位国家和公司来说，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任何经济或战略（冷战结束）意义。”^②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如此矛盾，在文化上虽不是像经济单极化矛盾表现得那样直接明显，但文化价值的认同、文化地位的认可、文化市场的竞争，如此等等的矛盾，还是普遍存在的，并有多极与单极的矛盾斗争，有时也是比较激烈的。历史与现实都是如此。

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结构中，民族文化的充分存在与地位肯定，是全球化的多样性保证。必须承认，在当前世界的现实格局，每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强弱，都各有其文化存在，并也具有文化的精华与贡献，由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多姿多彩。但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平衡，在现代世界上展露的程度不同，被人了解的先后不同，因此，在全世界上的显现程度上很不相同。全球是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全球，因此不仅各个民族应被确认，它的文化也应予确认。要想促进文化的全球化，则须将世界各个民族的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广泛地纳入世界的平等文化格局之中，成为世界多元格局的多样性的文化存在。在当前的世界范围内全球化问题大讨论中，许多有识之士无不担心全球化民族应有的存在地位与命运，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地位与命运，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的多余之虑。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他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商贸往来或信息交流的全球化。从‘世界化’这个词最广泛的含义来看，它首先对文化产生影响。”他特别提醒人们：“也许大家并不都知道，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交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加利对于这种文化境遇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我们处于一种相悖的境遇中：国家在赢得主权的同时也在失去主权。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生国际性的影响时，它便赢得了主权。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尤其依赖于凌驾于国家结构之上的新兴权力时，它便失去了主权。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民主，在世界化破坏民主之前让世界化得以民主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只有国际社会各个权力层次都行动起来，只有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国家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实现。”^③加利的看法是很有实际针对性的，他似在提醒许多弱势民族与国家，不要在全球化的这个必然走向中忘记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也就是必须保持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地位，不然就是强势文化的单一化、单极化。文化在全球化中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

从发源于商品经济和世界贸易经济交往关系并与之一起出现的世界文学与文化的交往关系，到今天全球性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与合作，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历史潮流发展程序就是向全球化进展的程度。如果对这个时间过程和实现的程度进行一下测量，就不难发现，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不仅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从少到多的程度，还有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从更多的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从接受别国到与别

国平等交流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限度将长久地存在下去，只要民族还存在着，它就几乎是一个无尽的过程，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就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度，找到克服限度的正常的方法和策略，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以便尽皆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文化的全球化，其前提条件和基础条件是参与经济的全球化，要成为世贸组织中的平等一员，没有经济上的力量与地位，文化上的参与力量是很受局限的。在当今世界上文化力量是受经济力量所支撑的，世界格局中的文化权力，归根结底也是经济的权力。因此我们看到，在当代世界中，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根本发展不起来自己的文化，自然也不会在全球化文化中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必须改变的历史局面。尤其是当今世界的经济艺术化、艺术经济化，使经济直接成为艺术文化的载体和依托，这更造成了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力的局限，也更见经济发展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没有经济实力的保证，必然难于实际参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美国不论有多少个哥伦比亚、三星、福克斯、环球电影公司卖给外国，它们生产的影片在口味上仍是美国的，这可以说是经济的文化消化力。

文化的全球化是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影响与接近。这其中的基因因素是民族文化，无数的民族文化构成为世界性的全球文化。所以，这种全球化绝对不是脱离民族文化而存在的超民族文化的文化。因此，为了推动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在民族文化创造中可以削弱和消解文化的民族性，而必须是认真地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创造有充分特点的民族文化，所谓“越是民族的越可能是世界的”说法，也是指向这个意义的一种论断。我们从已往的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经验中，可以充分了解到，真正能走出国家、走出民族天地的，乃是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出类拔萃的珍宝。在今后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中，最先最充分地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也必然是这种文化。

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比较普遍地施展到东方，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压迫，文化上的统治，使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各族人民饱受苦难，在文化上的破坏和阻挠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时的文化交流主导形势是单向的西方“送来主义”，而东方文化除了可以掠走的物质文化产品之外，其余许多都是不被承认的“落后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更体现为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权力和文化霸权，对东方文化形成了西化的威胁。所以，真正的文化全球化，决不是消解东方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平等的交流和互补，向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的目标切近。这个目标要求东西方都得实行平等的开放政策，就如同经济上的开放政策一样，以促进人类先进文化的共享。尽管文化全球化中，还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价值观念的不同，这都是一种阻碍条件，也是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一种限制，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互依，终究会找出解决交流接近的方法的。实际上21世纪的开始已经预示了非常好的兆头。

在文学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学或文化艺术理论的全球化，不仅具有更为广阔的天地，也是可以走在其它文化存在的前头，成为进一步促进文学与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先导。由于在人类的文化艺术发展中，有很多共同的规律，也有许多民族的特殊性，文学和文化的理论不过是这些现象的科学揭示和具体规律的总结。这些作为理论形态的存在，如

果真正的具有科学性，同时也必然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其理论范畴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也自然具有对应性。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差异、文学与文化差异，也会造成理论范畴的差异，甚至是范畴有无的不同。在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对于其他国家某些概念范畴的采用，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常事，只要是成为表意的符号，尽可以他为我用，不必认为是“失语”，中国的佛禅文化史已早有成功先例。例如“觉悟”、“化身”之类，不仅是佛家用语，也是世俗用语；在世俗用语中，已被赋予世俗所指意义。在文艺理论中实际也有许多这样的范畴概念，如“悲剧”、“典型”、“误读”、“文本”等等，都是正常交流引入，自觉的吸收，并不体现为话语的权力。

在全球化文学与文化语境中，世界各民族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发展程度，是本土文学与文化克服参与性的限度，并是最大可能参与全球化文学与文化创造的保证。因为全球化的文学与文化是以民族本土文学与文化为基本条件的，如果没有本土的文学与文化基础就没有全球性文学、文化：只有当各民族以优秀、丰盛、特殊的文化艺术汇成为全球化的文化艺术之后，始有这个共享文化艺术的存在。因此，对于中国的现时的文化艺术创造者来说，要想融入全球化的文化艺术格局，放眼世界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创造的立足基点必须是本土的，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非中国人创造不出来的文化艺术。而我们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正是创造这种文化艺术的原则保证。

我国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由于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总体文化状态上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当前对于世界性的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涌来之势，我们以什么对策消解它的副作用，建立我们的文化安全体系，不使它左右我们的文化市场；而且我们生产的文化艺术产品，不仅要有相当水平，还能打出去，走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对等交流，我们手中也能有足够的交流对象，这的确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课题。以电影、电视剧来说，涌入中国本土的已有不少，而且会越来越多；我国生产的能进入欧美地区的却非常少。何况，输出的作品常常是我们的生产有适应外国人的倾向，而外国输入进来的却有让接受者适应西方的倾向。如果这种趋势不能遏止和改变，而是无限发展下去，那在文化上确实有全球化带来“西化”和“同化”的危险。要避免和防止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我们除了必有的保护措施之外，还必须在深厚的民族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广泛地、高质量地创造我们的文化艺术，不仅以之供给国内的审美大众，也能不断增强走向世界的势头，以期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以现代化的文化大国、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 弗朗索瓦·沙奈著，齐建华译：《资本全球化》第18-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转引自许钧：《语言·翻译·文化的多样》，2002年6月28日《文汇报读书周报》。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曾庆元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

王哲平 何玲华

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全球化”是指在市场经济和科技进步的双轮驱动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强，最终使人类活动突破区域限制，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发展整体。放眼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惊涛拍岸，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文化冲突日趋激烈。各个国家和民族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发展已别无选择地须把民族经济汇入世界经济大潮；另一方面，又将更加顽强地坚守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完整。而后一方面目标的实现将主要取决于对本民族文化血脉相连的守持承传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因此，审视“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影响，树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心态——即弘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涤除其陈腐落后的诟病，寻求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对话、沟通，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前提。

—

当下，“全球化”正以其锐不可挡之势深刻而持久地影响、改变着人类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但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言，“全球化”犹同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的积极影响，亦不乏负面的消极作用。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全球化”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竞争和市场逐利行为打破了经济的国家和地域限制，把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日益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营造了一个“无疆界的市场”。全球资本的广泛自由流动，几乎脱离世界上任何国家政府的管制，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日渐薄弱；跨国公司的跨地区跨国度的大规模活动，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主权国家政府的作用随之相形见绌；世界性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国际分工新体系的重组，生产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销售全球化、消费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争相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即便发达国家也在千方百计地进一步挖掘市场机制的潜力，拆除壁垒，放宽限制。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年金融交易量500万亿美元，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在1万亿美元以上。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行以来，贸易自由化已从传统的商品贸易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累计达6.7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当今世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风行全球，并已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下发展模式的

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基于此,1995年12月7日的法国《世界报》预测:“5年前市场经济还只涉及到世界6亿人口,再过5年,市场经济将涉及60亿人口。”当然,我们也必须警醒,“全球化”也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两极对立,“在分配经济进步的蛋糕时,仍然是大块蛋糕分给少数人,多数人只得到蛋糕屑。”^①现实的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还带来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毒品走私猖獗、恶性病蔓延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全球化”对于扩大人类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的意义是革命性的。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它不仅提供给人人类一种崭新的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的工具,从而使通信手段或工具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还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尼葛洛蒂精辟地将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喻之为“从原子到比特”的革命:“过去,大部分的信息都经过人的缓慢处理,以书籍、杂志、报纸和录像带的形式呈现;而这,很快将被即时而廉价的电子数据传输所取代。这种传输将以光速来进行。在新的形式中,信息将成为举世共享的资源。”^②然而,藉依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可口可乐、阿迪达斯、MTV和Internet,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它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合法地”传遍了全球,塑造了一个本杰明·R·巴特称之为“麦克世界”的体系——一个由于各种跨国贸易的集中而使生活方式同质化的虚拟世界。十分重要的是,这种崭新的人类文化载体,可以突破社会体制的不同,增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极大地促进全球范围内跨越民族的情感参与和心理认同,进而使其影响迅速扩大并且日益涵化或加剧。对此,一些西方学者欣喜之余也不无忧虑,认为这种文化渗透使各民族原有的特色文化越来越被从中心挤到边缘,这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亦无法幸免。

从文化学角度而言,“全球化”极大地刺激了文化观念的更新和文化生产力的空前解放,诸如CD、VCD、DVD、电脑艺术、网络艺术等新的文化形态层出不穷,文化工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生机无限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电影产业就占据了全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2/3,达105亿美元,被列为居通讯产业、石油和石油加工业、航空产业之后的美国第四大出口支柱产业。而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400余家美国大众传播公司的总收入高达1500亿美元。方兴未艾的文化工业使政治权利大规模地从经济和社会中退出,一元的政治社会转变为二元的政治、经济社会。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和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文化强化了各自的独立性,公民权利得到尊重,文化走出政治藩篱。政治价值减弱,文化教育、审美和娱乐的价值愈益凸显,主要由少数政治精英掌握的文化权利转变为公民普遍享有的文化权利,“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与此相伴随,“机械复制”以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以及真实性、权威性,破坏了艺术品独特的“光韵”,引导大众观赏其世俗内容,从而肢解了文化精神;“文化工业”堂而皇之地消解了艺术的“个性”,使文化失去了不断创新的审美冲动和理性探求。面对喧嚣四起的大众文化(尤其是电脑文化)和由各种“影像”构筑的世界,文字让位于图像,思考让位于直觉;虚幻的形象置换了真切现实,形象化生存取代了真实的生存;长时段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商业化、泡沫化、粗疏化、平面化、模式化随处可见。人们于尽情享受虚拟世界的感性狂欢、恣意宣泄秘不示人的意欲中,钝化了可

贵的理性思维，消泯了快感与美感的边界，同时亦渐渐远离了现实人生关系中的情感交流和生命感受。

二

“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迥异、且又刚刚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若欲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突出的要务就是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铜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超越。这将有赖于人们将历史意识与时代意识、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结合起来，一方面以健康的心态对待历史文化，将现实中国文化植根于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以时代精神和时代文化来熔铸历史文化。一方面要有民族的自尊与自强，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形式；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广泛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充实和丰富民族文化，将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的大河中去。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蕃衍承传过程中，积有许多历史的尘垢。例如，纲常名教观念、尊卑等级思想，它与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有民主与自由的权利格格不入，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宗法关系和小农意识，不仅使人难以挣脱血缘亲情关系的羁绊，也不可能产生时人呼唤的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忠于君”、“孝于亲”^③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④等清规戒律禁锢了人们自由的心灵，必然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出现，势必遏制、压抑人的个性与才智的发展；“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⑤的复古怀旧历史观，常常以发思古之幽情的思维方式美化过去，从而让未来服从过去，让现时回归历史……尽管如此，余英时先生依然认为，整体地看，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并没有完全离我们而去，只不过是存在于某种模糊笼统或“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之中。中国文化经得起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的挑战，而不致失去它的存在根据。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特殊方向，弘扬了人性中的一些特定方面，在现代社会具有独到的价值。举凡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穷本探源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等中国人文精神，始终是应该弘扬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其巨大的人文主义价值，在今日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一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 1958 年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所言，西方人应该学习中国人“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和“天下一家的情怀”^⑥。简言之，西方人应当学习中国文明那种和平的秉性和道义的精神。

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共同面临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如何化解这五大冲突，是当今文化的共同课题。儒家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恰好可以为这方面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在心为形役、人为物役的社会，儒家的修身理论可以作为人们的座右铭和清醒剂；在冲突不断、战乱频仍的世界上，儒家的仁学思想也许值得光大；在臭氧稀薄、山荒地瘠的环境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天人合一”也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尔虞我诈、欺世盗名的角力中，老庄的“少私寡欲”当能提供心灵的启迪与助益……韩国学者柳熙汶在谈到韩国与台湾的经济成长之奇迹时，明确阐明了儒家文化对两地经济腾飞的影响——即文化和制度与经济发展存有密切的关联性，而文化与制度也互为因果关系。他认为，韩国与台湾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均须归功于以下几个因素：高国民储蓄率、高投资率、提高对人教育的投资以及政府积极推动经济政策带动市场的策略。而上述几项因素均是受东亚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最有力的见证。高储蓄率为儒家文化“勤俭节约”精神的体现；儒家的诚敬思想给予劳动者注入热情的工作动力；儒家的调和与共同体思想在企业经营里给予劳资双方注入和谐的增进剂；热衷于对人教育的大量投资态度源自儒家“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八个德目和“修身齐家、修己安人”等思想。^⑦西方著名哲学家凯泽林在其《哲学家旅行记》中，不仅高度赞赏儒家伦理，而且给予道家思想以崇高的褒扬：“无可否认，道家经典中蕴含着也许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深刻的人生智慧。这一认识正是基于我们的理想——创造性的精神自足而得出的。”当代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致力于理解道家，他在《老子和龙树——两位亚洲神秘主义者》一书中，显现了其道家接受中的偏爱：“老子的情怀中无佛教轮回之威胁，不求摆脱痛苦之轮；亦无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对无法摆脱的原罪的恐惧，不需要神化作凡人赴死以救赎人类的恩典……”。此外，我们从海德格尔将“无”视为充实的非虚无主义观点也不难窥见道家和禅宗对其思想的沾溉。

三

有人认为，“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国家与民族差异正在消失，“地球村”正在出现。而“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这种西方化过程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即已露端倪，如今则愈演愈烈。西方化将导致中国的自我他者化。这种担忧虽不乏其理，然而，人类文化的生生不已，一方面包含着由新的生产力激活的反传统活力与传统的惰力之间的挑战与应战，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挑战与应战。人类文化正是在这种挑战与应战的交互作用中，获得生命力，并不断赓续、变迁和超越。

人类文化交流史业已证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⑧古希腊最早的克里特文明直接受惠于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沾溉了其后的迈锡尼文明，中世纪的欧洲借鉴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而古希腊、罗马文明则为整个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一个上升的、具有充分自信力的民族，总是善于汲取他民族文化之长，以为自己的养料的。鲁迅在《看镜有感》里，赞扬汉代人勇于汲取异族文化，将外来动植物毫不拘忌地拿来充装饰的花纹，认为这是民族自信力的表现；而批评宋代的文艺国粹气味熏人，对外来东西推拒、惶恐、退缩、逃避，说这正是衰弱的表现。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即不合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徜徉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希腊的绘画和雕塑，阿拉伯的数学和天文学，“西域”的杂技、舞蹈、音乐（如胡舞、胡琴、唢呐等）、作物（如胡萝卜、苜蓿、西红柿等），古代地中海和西亚的玻璃、琉璃、次玉、珊

瑚、琥珀、玛瑙、水晶、钻石等西风东渐之惠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即便是椅子、凳子一类的家具概念也都属于舶来品，更遑论对中国文明的价值形态产生结构性影响的佛教了。

汉唐盛世，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周边地区发生深远影响。17世纪后，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国文化又西渐欧洲。当时《论语》、《周易》及许多中国文化典籍都被译成西文在欧洲传播。辜鸿铭在谈到欧洲新道德文化意识的产生和东方文化传播之间的关联时慨叹：“值得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知道也估计不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它对杜·克罗斯所谓的‘理性胚芽’的兴趣没起什么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发展与传播是起过促进作用的。众所周知，那种‘理性胚芽’最终发展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它在本世纪带来了欧洲中世纪制度的‘Calutegeneral（全面解体或全面崩溃）’。”^⑨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与文化原理，在这个体系和原理中，文化本身是自足的。因此，吸收外来文化并不能动摇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因为我们有不同于别人的文化基因，正像吃牛肉并不会变成牛一样。在日本文化与汉文化的交往中，日本诗歌大量汲取了中国诗歌的词汇、文学意向、对生活的看法以及某些表达方式，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诗歌不是变得和中国诗歌一样，恰恰相反，日本诗歌的精巧、纤细、不尚对偶声律而重节奏、追求余韵、崇尚闲寂、幽玄等特色就在与中国诗歌的对比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发展。王瑶在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成绩时说：“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只有诗文评或选本式的东西，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林传甲、谢无量等早期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文学范围及概念都十分驳杂；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⑩

由上可见，任何一种文化都葆有其无法遮蔽或消解的民族性，都离不开所处历史时代的文化整体的价值，并受整个时代文化价值力量的统辖与制约。它是形成不同文化特征的最为本原的东西，越是成熟的越是影响深远的文化越是充满民族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预言，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⑪这种情形预示着人类将面临一次空前的文化整合。其结果，人类文化精神将在一个新层次上超越迄今为止所面临的分裂与冲突的格局。

当今世界已经发展为这样一个时代：政治上互相求同存异，经济上互相联系依赖，文化上互相渗透融合。因此，在“保护民族文化，促进全球文明”的前提下，我们的文化意识理应展现出一种宽容、理解和涵摄的精神。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敞开的文化心灵。通

过对异质文化的整合，在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重新构筑一种强有力的张力场，从而增大其可能性空间，增强其生命力。《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经过“全球化”的挑战与自我更新之后，必将以新的风姿展现它的博大精深，它的独特价值！

-
- ①王锐生：《经济伦理视野下的全球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②尼葛洛蒂：《数字化生存》第12-13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③④⑤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⑥景海峰：《当代新儒家》第43-47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⑦柳熙汶：《儒家文化影响下韩国与台湾的经济发展》，载《河北学刊》2000年第3期。
⑧⑩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第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175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⑪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曾庆元



全球化语境下 中国文论的焦虑与选择

戴 黛

在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的文化界、学术界也几乎无处不在议论全球化语境，中国文学理论界面对这一大潮的确也作了认真的思考，并且提出了种种应对的策略。诸如：“重构说”：“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要，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该面向现代化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①“对话说”：“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包括批评话语和操作的语言）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②“互动说”：“‘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互动的，越是‘全球化’，就越能激发‘本土化’，所以‘本土化’、‘区域化’、‘民族化’不能不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③“挑战说”：“面对历史性的挑战，对现成的文学话语进行阐释、解析和重构，揭示它们与文化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互动，保持自己的美学立场，将某些传统的话语转化为现代话语，在吸收西方话语的同时，向西方文学理论发出挑战，促使西方话语在某些根本价值取向上，发生变异，与中国传统发生交融，产生出新的话语或者派生的范畴来，这本是文论历史发展的挑战和机遇。”^④“本体说”：“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外围；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⑤“未来说”：“如果文学在各个环节都远离了商业化的和功利的目的（同时也只有如此），文学才可能成为公有财产。到那时，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全球化、文学的世界主义理想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学的全球化是属于未来的事情，现时的全球化则主要局限于经济的领域。”^⑥“建构说”：“根本的出路是：既要对话，更要建构，即建构属于自己的文论体系，而且，也只有建构起了自己的文论体系，对话才能够在完全平等的、可观的层次上进行，才能使我们的文学理论能够为他人所承认。”^⑦等等。

从上述不完全援引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论界对全球化语境的极大关注和热情，应该说，这种现象显示了中国文论界迫切希望与世界接轨、迫切希望加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态势。但是难道我们没有觉察到这其中已经透露出一种文论界的焦虑和惊慌？面对